

济公全传

济 公 全 传

花 城 出 版 社

出 版 说 明

济公的故事，在我国民间流传很广。济公这个形象，是一个于嬉笑怒骂中扶危济困、抱打不平，而又酒肉无忌、玩世不恭的喜剧性人物。通过他的活动，虽然零碎，却相当具体地反映了清代城镇生活风貌，揭露了一些上层统治者的骄奢淫逸，刻画了下层人民的斑斑血泪。由于历史局限，本书也是精华与糟粕杂陈，尤以因果报应、人生虚幻的说教，时从人物口中流出；尖锐的斗争，常以妥协告终；而行文冗赘，结构松散，水份不少，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。我们内部少量出版，供研究民间文学者参考以及文艺工作者汲取某些精华之用。

评《济公全传》

黄天骥

—

济公的故事，在我国民间流传很广，一些佛寺，也有济公的塑像。其像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手执蒲扇，在庄严的罗汉丛中挤眉弄眼。有一个庙宇，还别出心裁地让他蹲在大殿的横梁里。和尚告诉人们：济公正躲在那里偷偷地吃狗肉呢！

《济公全传》是济公传说的结集。据孙楷第、傅惜华先生查考，以济公为题材的小说，有王梦吉撰写的《济公全传》三十六则；务世堂刊本《济公大师醉菩提全传》二十回；日本宫内省收藏的《济公传》十二卷等等。《济公全传》共二百八十回，（后四十回很少写济公的活动，内容不伦不类，与前面的二百四十回风格不一，当为后人续貂之作。此次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就删去了后面的三十八回。）是有关济公故事的最完备的稿本。可惜它的作者，现已无法查悉。

关于《济公全传》创作年代的问题，我们在书中倒可以窥见一二。

一百六十八回，作者写道：“宋朝年间，京营殿帅刑廷大人，就类似清朝的九门提督一般。”这清楚地表明，《济公全传》写成于清代。另外，书中还有以下句子：

“钱心胜偷了钱，内心得意，唱了哈哈腔，又唱二簧，又唱时调小曲。”（第六十九回）

“临完了唱一曲《四郎探母》。”（第七十九回）

“按说书演义，他乃是前宋《精忠传》牛皋之孙，乃是金毛太岁牛通之子。”（第一百六十五回）

我们知道，《精忠传》即《说岳全传》，是清代钱采的作品，金毛太岁牛通也是小说里的人物。钱采乃康熙、雍正年间人，《济公全传》提到他，说明本书的写成在《说岳全传》出现之后。此外，二簧原是湖北的小调，流行于乾隆年间，《四郎探母》也是乾隆年间流行的剧目。

根据以上的迹象推断，《济公全传》的创作年代，当为清代中叶。

二

济公何许人也？据《花朝生笔记》说：“实则南宋初无是人，乃因六朝释宝志而讹传者也。”

至于释宝志，乃是南北朝时代大名鼎鼎的和尚，关于他的事迹，《南史》卷七十六有载，且录一段如下：

“齐宋之交，稍显灵迹，被发徒跣，语默不伦。或被锦袍，饮啖同于凡俗。恒以铜镜剪刀镊属挂杖，负之而行。或征索酒食，或累月不食。预言未兆，识他心智。”

我们知道，南北朝时代，战乱频仍，生产倒退，人民生活十分痛苦。这时候，世家豪族需要利用宗教麻醉人民，巩固封建秩序；而一些受苦受难的人，找不到出路，也需要以神龛佛寺作为精神的避难所。因此，从东汉时代传入的佛教，便大行其道。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说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

烟雨中”。金陵一地，佛寺如麻，佛教之盛，可见一斑。

在南朝，佛教出现了“中国化”的倾向。本来，佛教是外来的宗教，它所遵守的信条，与中国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大相径庭。晋以后，佛教徒聪明地让佛教民族化，他们没有完全按照印度原来的“大乘”理论去解释佛教，而是以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迎合“大乘”学说。这一来，佛教就易于为中国士人所接受了。与佛教理论中国化这一进程相适应，一些和尚也离开了印度佛教的教规，在生活上接受了中原时尚的影响。他们信仰的神，虽然还是外国的、西域的，但他们自己的派头，却与中国的名士一体化。被认为是神通广大的释宝志，就是以中国名士姿态出现的一个和尚。

魏晋以来，名士们时髦的趋向是：不修边幅，放荡不羁。所谓“竹林七贤”的遗风，一直为南北朝的知识分子所遵循。《南史》所载的释宝志和尚，有时披头散发，有时穿起锦袍，有时胡说八道，有时饮酒食肉，简直就是披上袈裟的竹林旧友。他的行为，有异于一般和尚，却又为当时人民所熟悉，于是，他的名字便流传开来，由于他疯疯癫癫，人们称他为颠和尚。此后，宝志误传为宝济，志公便演变而为济公、济颠。到宋元明清几代，济公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据说他经常活动于杭州西湖灵隐寺一带，至今苏杭地区也还留有他的“圣迹”。

民间故事流传的过程，实际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。人们在口口相传的时候，往往把自己所熟悉、所想象的事件，加插到故事中去。所以传说中的济公形象，虽以释宝志为原型，但又比原型生动得多，丰富得多；历史上一些古怪和尚或者颠疯头陀的行为，也被人们捏合在济公的形象里。例如，赵宋时代盛传“呆行者”叶守一捉弄奸臣秦桧的故事。有意思的是，叶守一也和济公一样，活动在杭州西湖灵隐寺一带。关于他的形象，元

代戏剧家孔文卿的杂剧《地藏王证东窗事犯》有较详细的描写：

“休笑我垢面疯痴，恁参不透我本心主意，则与世人愚不解禅机。鬅髻着短头发，挎着个破执袋，就里敢包罗天地。我将这吹火筒却离了香积，我泄天机故临凡世。”你看，叶守一那一身打扮以及行事方式，不是与济公颇为相似吗？

如果说，在南朝，释宝志只是疯疯癫癫，其行动与政治无涉；那么，在南宋，叶守一却在疯疯癫癫地干预政治；而济公，则已成为“专管人间不平气”的和尚了。从干预现实这一点上看，济公的行径更接近于叶守一。可能这两个同被说成在灵隐寺显灵的和尚，其传说已逐渐合流。至于叶守一戏弄和惩罚秦桧夫妇的情形，钱采的《说岳全传》有详细的描绘。如果我们把《济公全传》中济公戏弄惩罚秦相父子的回目来与之比较，将会发现二者颇有相似的地方。

象叶守一那样的疯癫和尚，民间传说中还有不少。象杭州南屏山净慈寺就有一位名叫诋毁的和尚，“不讲究青灯黄卷，专喜欢议论世事，要讲便讲，要骂便骂”，连乾隆皇帝也被他戏弄一番。^① 不难理解，当《济公全传》的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，诸如叶守一之类和尚的影子，便会渗进笔端。因此，济公的形象，虽与释宝志一脉相承，但又远远超出了原型。在他的身上，实际上概括了许许多多以疯和尚姿态出现的宗教徒的面貌。

三

释宝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济公则是来自西天的“神”。《济

^① 参看《西湖民间故事》，杭州文化局编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公全传》第一回写道：“他本是奉佛法旨，为度世而来，自己在外面济困扶危，劝化众生”。所以，当济公降临人间时，红光罩院，异香扑鼻，不同凡响。

济公要劝化众生，就是要向人们宣扬佛家的哲理，劝导人们皈依佛教。大家知道，佛教发展到清代，“禅宗”一支，势力最大。禅宗和律宗、天台宗等佛教支派相比，教义显得简单易行。它认为不必辛苦修行，也不必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，只需顿悟前非，便可进入涅槃之境，这叫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因此，禅宗更易诱人购买进入天国的门票。在《济公全传》中，济公经常念诵一些似歌非歌的偈言，内容无非是叹息人生无常，荣华如梦，劝说人们脱离现实。这些来自禅宗的歪理，渗透着封建迷信和虚无主义思想，当然是消极的。书中有些地方，还大肆宣扬因果报应观念，极为荒诞可笑。

不过，《济公全传》还有可取的一面。

济公是要到人间“济困扶危”的。这就说明，作者承认人间有“困”需济，有“危”要扶。当济公大显神通的时候，世间困厄，人生百态，随着灵光扇影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于是，作者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幅清代城镇的风情画。

济公主要活动于江南的城镇。那一带，市廛繁荣，商店林立，酒楼妓院，鳞次栉比。在那里，有腰缠万贯的富商，但更多是生活凄苦的工匠、书生、小商、小贩。在书中，作者的目光，也更多时候落在贫苦大众身上。他写济公拯救的第一个人，是镇江府的锤金工匠董士宏。董士宏母亲患病，只好卖女买药，后来女儿不知下落，银子被人偷去，他觉得“死了倒比活的好”，走投无路，准备自杀。当作者让济公解开了勒在董士宏脖子上的绦带时，也就解下了城镇的繁华喧闹的面纱，给人们看到了贫苦居民的斑斑血泪。

在城镇，有人拦路抢劫，或者开设黑店，谋财害命；有人装神弄鬼，骗财骗色；衙门黑暗，官吏糊涂。它给人们的印象是乱七八糟，光怪陆离。在一片喧嚣之中，构成时代的主旋律是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。

我国从明代中叶开始，封建经济的母胎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嫩芽，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。城镇各阶层命运的主宰，仍然是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，这一点，《济公全传》里有比较真实的反映。象说杭州城内权势最大的秦丞相，为了建造楼宇，可以强征木料，连灵隐寺大碑楼的大梁也被他拆去。秦丞相的儿子好色，他可以随便抢人妻女，谁不顺从，便抓起来严刑拷打。“宰相家人七品官”，就连秦府的几个管家，也是炙手可热。有些官吏豪绅，为了升官发财，千方百计巴结秦府，象刑廷老爷陆炳文“有事求秦相”，便帮着秦相兄弟王胜仙作恶。在一百一十一回，作者又写了镇山豹田国本和秦府结成亲戚，有了靠山，便“无所不为，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包揽词讼”。总之，在城镇的各个角落，以秦丞相为首的封建统治者，作威作福，残民以逞。

《济公全传》的许多章节，不遗余力地揭露了封建时代城镇的阴暗面，但全书的批判重点，则是那些依仗父兄权势压迫百姓的“衙内”。在书中，封建官吏的子侄，几乎都是恶棍。秦丞相的兄弟王胜仙，绰号花花太岁；儿子秦恒，绰号催命鬼。他们养着许多打手，无恶不作。莫丞相的儿子好玩蟋蟀，小贩杨文彬不小心把莫公子的蟋蟀盆碰倒，跑了蟋蟀，被迫自杀；罗丞相的儿子也好斗蟋蟀，一头蟋蟀跑了，他竟下令拆掉民房寻找，直拆了八十余间，闹得天翻地覆。这些人，除了好色贪玩以外，还贪财善敛。罗丞相的侄子，在外面作了一任太守，便“剥尽地皮，饱载而归”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封建时代的城镇，是封建统治阶级集中财宝和挥霍享受的

地方。城镇里游手好闲的纨裤子弟，倚仗封建特权，给人民制造了许多的灾难。《济公全传》的作者，对所有的“衙内”都投以鄙夷的目光，给予尽情的嘲弄。尽管其抨击有时显得力量不足，也没有涉及封建统治的根基问题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反映了人民厌恶封建特权的情绪。

在揭露封建势力专横统治的同时，《济公全传》又真实地写下了城镇人民生活没有保障，随时随地会遇到飞来横祸的情景。象写豆腐店的小店主周得山，生意原来做得不错，只是一时失策，借了万珍酒楼的高利贷，无法偿还，结果被债主“把豆腐店全摔了，连磨盘也摔破了，水桶也劈了，一概家伙全摔净”。画工阎文华安分守己，和妻子胼手胝足地度日，可是，其妻被恶霸吴坤看上，阎文华便家散人亡。他无路可走，寻死前长叹一声：“苍天！苍天！不睁眼的神佛！无耳目的天地！”这番话，一字一泪，它是受迫害的市民对封建统治阶级悲愤的控诉。

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儒生，也大都命途多舛。他们当中一些人即使可以躲过妻儿被掠的悲剧，即使没有和官吏豪绅直接冲突，但也无法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。他们在“市虎”的势力范围里寄一枝栖，而“市虎”偶一声嘶，都会使手无缚鸡之力的穷儒们葬身无地。在第十二回，作者写文士马沛然在西湖游船上当账房先生，生活虽然清苦，尚可将就糊口，谁知后来恶霸王胜仙在西湖一带调戏妇女，没有人敢来雇艇游湖，马沛然便被打破饭碗了。不错，王胜仙没有用锋锏对着马沛然，但他掀起的风浪却使多少象马沛然一类的人物永远沉沦？又如文士高国泰，经不起房租催逼，生活无着，只好到河边帮人纤船。别人唱的是拉纤号子，他不会唱，只好哼哼嗡嗡地念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惹得“众拉纤人一阵大笑”。这笑声，不是混和了城镇穷儒的眼

泪么？

就这样，《济公全传》拉开了清代城镇的帷幕。有时候，作者还把城镇中贫富两种人的生活作了对比。象第六十八回，济公的徒弟陈亮、雷鸣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：

“花园里面，极其讲究，有假山子石，有月牙河，牡丹亭，蔷薇架，小舟船，留芳阁，避暑楼，赏雪亭。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花园子当中有三间楼房，支着楼窗，挂着帘子，有几个仆妇丫鬟，拿了小筐下楼摘花。”

就在这富丽堂皇的花园旁边，陈亮、雷鸣又看到另一种景象：

“一个年轻的少妇，头上抹着白布，身上穿着孝衣，系着麻辫子，穿着白衣，白布蒙鞋，旁边站着一个老者，在地下铺着一张纸，上写着一张告白：‘四方爷台得知……小妇人丈夫素作小本营生，现在身患恶疮，不能动转。小妇人婆婆一故，衣衾棺木皆无。家中素无隔宿之粮，当卖俱空，遭此大难，惟唤奈何。万出无奈，叩乞四方仁人君子，施侧隐之心’。”

在书中许多地方，作者写到了小市民寅吃卯粮，卖儿卖女，而富豪们追欢买笑，纸醉金迷。不管作者是否出于自觉，他的描绘，总算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封建时代城镇的面貌，给人鲜明强烈的印象。

《济公全传》在对城镇生活的描绘中，还接触到封建时代后期人与人关系变化的问题。

在封建时代，封建伦理道德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支柱。随着地主阶级的走向没落，封建伦理道德也逐步崩溃。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开了，而金钱的力量，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。《济公全传》写到，讹诈钱财，已成为城镇一些人犯

罪的主要动因。在街头，到处有卖假药的，连出家人也把切糕捏成团子，诳说这是万应灵丹；有些和尚假装瘸腿，为的是掩人耳目，晚上好去偷盗钱财；有些人把桥弄断，“摆渡讹人”。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，于是发生了互争生意聚众殴斗的事件。

为了钱，有些人把“礼义廉耻”的遮羞布索性抛开。在四十一回，作者写下了相当精采的一幕：孝廉李文芳的弟弟死了，其妻在家守寡。李文芳“发现”她和别人有奸情，于是大叫大嚷，说她玷辱门楣，把她赶回娘家。事实的真相是，李文芳企图独占家财，不惜想方设法陷其弟妇于死地。很清楚，正是金钱的诱惑，使孝廉公丧心病狂。如上所述，作者写济公到过的城镇，到处争财逐利，“闹嚷嚷似蝇吮血”。这一幅幅图景，叠印在读者眼前，使人强烈地感到封建后期人与人的关系，开始注入了新的因素。

当然，《济公全传》对封建后期城镇风貌的描绘，远不是全面的，也不是高明的，有些场景，如同散珠碎玉，零乱驳杂。但是，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材料，有相当的认识价值。

四

在城镇人民水深火热之际，作者请济公下凡了。

在作者笔下，济公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他会七十二般变化，又会念六字真言，只要喊一声“唵嘛呢叭咪吽”，对手便被制服。再不然，一拍天灵盖，现出罗汉灵光，就可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一切坏人，一切妖魔，都逃不出他的掌心。

不过，济公又和一般的神仙不同。

在封建时代，地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，往往把神描绘得高不可攀。神有一副庄严宝相，穿一身纓络宝衣，顶一轮璀璨光环，让人肃然起敬。而济公，却被写成象个凡夫俗子，他生活在广大群众之中，和市井小民一起吃喝玩乐。他的行止，甚至还不如普通的和尚。和尚不吃荤腥，他却大杯酒，大块肉，尤其爱吃焖得烂烂的狗头；和尚宣称“不打诳语”，他却经常信口开河；和尚讲究修心养性，他却没有一刻安静，有时甚至闹到妓院中吟诗写字，闹进人家的内室里喝酒喧笑。

济公也有七情六欲。《探娘舅济公归故里》一回，作者写他回到故乡，看到旧居封闭，亲友凋零，不禁“睹物伤情，回忆当年有父母在堂，家中一呼百诺。如今只落得空房一所，自己孤身一人，未免心中可惨。”本来，佛门讲究六根清静，四大皆空，而济公竟有淡淡的哀愁，其和尚气味真可谓少而又少。他有时还喜欢卖弄一点狡狴，例如会打发徒弟爬上屋顶，假扮韦驮，喊一声“吾神来也”！借以吓人，从而显示他有差神遣鬼的手段；钱塘门炭厂的掌柜，卖炭时“不给好炭，净给烟炭”，济公便找机会把他捉弄一番，出一口气。可见，作者在塑造济公的形象时，其依据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凡人，而不是在庙宇里正襟危坐的泥胎。我们认为，作者能把神的形象人格化，这是济公性格使人感到亲切，获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。

济困扶危，是济公性格的一大特色。

首先，济公包医百病。不管什么奇难杂症，经他诊治，便可妙手回春。看来，封建时代后期，城镇的医疗条件仍然很差，各种疾病威胁着人民的健康，人们便幻想出现陆地神仙，能以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为病患者解除痛苦。

济公还为人们排除自然界造成的灾难。例如白水湖的水怪作怪，“由湖水里出来两股阴阳气”。这水怪每天要吃一个童

男，一个童女。所谓水怪，其实是神化了的某种自然力量，它如果不是水中动物，就是险恶波涛的借喻。人们希望解除自然的险阻，于是就有了济公制服水怪的传说。

当然，济公管得最多的，仍是人世间的不平事。作者之所以创造济公的形象，主要是要他为受欺压的弱者打抱不平的。

在第二回，作者概括地点出济公形象的特征：“经不谈，禅不理，吃酒开荤好戏，警遇劝善度群迷，专管人间不平气。”最后一句，应是济公形象的核心。济公往往突然心血来潮，他掐指一算，知道有人受了冤屈，叹息一声：“这事我焉能不管！”书中的许多事件，便从济公这一声叹息带出。于是，官吏横行不法，他要管；衙门审错案件，他要管；贼人谋财骗色，他要管；小姐被卖为娼，他要管；儿子对亲不孝，他要管……总之，只要他知道有人受到欺负，处境困难；或者官吏碰到难题，不能解决，就要挺身而出，施展法力，济困扶危。

疯疯癫癫，是济公性格的另一特征。在我国小说史上，济公是一个以游戏人间的姿态干预现实的喜剧性形象。

济公的外貌十分古怪。“其貌不扬，身高五尺来往，头上头发有二寸余长，滋着一脸的泥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丝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拖着一双破草鞋”。这身打扮，不伦不类，和尚不象和尚，乞丐不象乞丐。至于他的举动，更是十分滑稽。有人要暗害他，放火烧他，他一点不在乎，施展法术，撒一泡尿把火烧灭。他给人治病的丹药，名为“八宝瞪眼伸腿丸”和“要命丹”。他吃喝时弄得满脸汤汁，饕餮狼飡，极不雅观。他打架时拿着破扇东窜西跳，一味拧对手的胳膊，肆意逗弄玩耍。诸如此类，使人捧腹不已。

在古代，我国流传过许多关于“义侠”、“游侠”的故事。侠客们排难解纷，锄奸诛恶，他们被弱者视为救星。济公在城镇中

从事的斗争，其性质和侠客们是一样的。事实上，书中也写了他收罗一批侠客作为门徒，作者让侠客们飞檐走壁辅助济公，用刀光剑影烘托济公。但济公与侠客不同的是：他是以疯僧姿态出现的神仙，这一来，其斗争方式便与一般人大异其趣。例如他要惩处逆子，只需用手一指，让其两条腿不由自主地飞奔，腾云驾雾般一直跑了二百多里。又如他要惩罚贪财的家奴，便把顽石幻化为宝贝，骗他们扛着七八十斤重的假货往来奔走。当人们看到受罚者气喘如牛的时候，都会为济公的幽默会心微笑。

最能表现济公喜剧性格的，是作品中有关惩治王胜仙、陆炳文的情节。王胜仙夺人妻子，陆炳文为虎作伥。他们伤天害理的行为，济公当然不能不管，他神奇地叫陆炳文的肚子忽然膨胀起来。陆炳文觅遍名医，无法治愈，只好请求济公诊脉。济公告诉他，肚子怀的胎，“可跟旁胎不同，大人这是一肚子阴阳鬼胎。”陆炳文求他开药，济公写的药方是：“天理良心一个，要整的；公道全分。”这药方自然无法捡到，而当陆炳文承认自己作了亏心事时，肚子就不胀了。当人们看到这作恶多端的人狼狈不堪时，都会吐出一口恶气。后来陆炳文又帮着王胜仙陷害梅成玉，图谋霸占其妹梅碧环。济公便着梅氏兄妹假意答允，通知陆炳文替王胜仙抬轿迎亲，然后点化一条白狗，让它坐上花轿。这一段写得十分有趣：

“话说济公禅师把白狗叫过来，把四个火烧给白狗吃了，白狗摇头摆尾，前蹿后跳。和尚拿红头绳白粉两个耳兜拴上，又用红头绳把白狗的嘴一系，拿胭脂粉脸上一抹，把裙衫短袄给白狗一穿，把红绣鞋给白狗后爪一穿。和尚口念‘唵嘛呢叭咪吽’，用手一抹白狗的脸……白狗坐在那里，真是变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。”

到晚上，这白狗便代替梅碧环，被陆炳文用轿儿抬到王胜仙家

里。王胜仙喜悦非常，和“美人”拜了天地，同入洞房。他过去“一搂白狗，他要跟白狗亲嘴，本来白狗正有气呢，照定王胜仙脸上一嘴，把王胜仙鼻子咬掉了。”结果，为非作歹的王胜仙掉了鼻子，助桀为虐的陆炳文也掉了官职。

很清楚，济公惩罚陆炳文、王胜仙的方式，夹杂着揶揄嘲弄的成分。也只有象济公这样的人物，才可能异想天开地找出使人笑破肚皮的惩罚手段。在书中，作者写济公的行动，有时竟象顽童在恶作剧，他的斗争，贯串着喜剧色彩。他不仅要结束人间的悲剧，而且将悲剧变之为喜剧；不仅要为被压迫者报仇雪恨，而且要让压迫者出乖露丑，要使旁观者哈哈大笑。而通过充满喜剧色彩的漫画般的描绘，作者也鲜明地展示了济公的喜剧性格。他让人们看到，济公敢于嘲弄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统治者，同情被压迫的群众，在污垢古怪滑稽可笑的外表后面，有一颗善良的心。

总的来说，《济公全传》颇为成功地刻画了济公的性格。这一个与众不同的喜剧形象，在文坛中独树一帜，获得了群众的喜爱。但是，我们也要指出，《济公全传》在情节结构方面疏于考虑，有些地方架床叠屋，拖沓重复，这又影响了对济公形象的塑造。换言之，这是一块打磨未善的美玉，虽然闪耀着光彩，却处处呈现出粗糙斧凿的痕迹。

五

济公形象的出现，并不是偶然的。

在清代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，经过顺治、康熙两朝的治理，局面基本稳定，经济飞跃发展。这一来，经历过农民大起义的地主阶级，惊魂已定，可以重整

旗鼓，进行反攻倒算。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，地主阶级和商人互相勾结，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。他们放高利贷，开典当铺，“获利盈千累万”。①而贫苦大众，“耕作之际，家中所有，靡不在质库之中”，冬天“以食米转换寒衣，交春又以寒衣易谷”。②劳动人民用汗水使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而他们的生活却进一步贫困化。

在那夜气如磐的年代，有些人奋力抗争，象康熙四十三年，湖广人王汉杰等三百余人，“将在城当铺，肆行抢掠”。③但绝大多数人在地主阶级统治的牢笼下动弹不得。当他们感到前路茫茫的时候，便幻想出现救星，为他们解除现实的苦难。济公的形象，正是作者概括了一部分群众烦恼痛苦的情绪幻化成形的产物。那时候，人们的思想矛盾重重，既希望有人能清除社会上的污垢，又希望脱离现实，找到一个精神的避难所。于是，作者让济公周围聚集着一批侠客，并且让济公的所作所为也颇似侠客；同时，济公以一宗教人物的姿态出现，让他用玄妙的偈语和无边的法力去抚慰那些空虚的心灵。总之，在书中，济公亦侠亦僧，似疯非疯，有时入世，有时出世。这一形象所呈现的斑斓驳杂的色彩，恰好是找不到出路的群众思想混乱的反映。

济公形象的出现，和清初游民队伍的日益扩大，也有密切的关系。

马克思曾经说过：“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比较而言不断减少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。”④在清中叶，随着手工业

① 《治浙成规》礼集，乾隆二十一年六、七月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三一，乾隆十三年三月。

③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一六，康熙四十三年六月。

④ 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出版。